

核心阅读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战争既是检验“四个意识”强不强的最直接标准，也是铸造“四个意识”的强大熔炉，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培育、塑造的“四个意识”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重温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意识”的初步形成和体现，对于我们今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精心培育的政治品格。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意识”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初步形成和体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善于从政治的高度和指导军事问题，紧紧抓住民心这个最大政治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培

# 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意识”的初步形成和体现

□ 杨大志

心这个最大政治。

正确认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解放战争战略全局的形成，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和大批解放区的产生，使得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观照战争全局越来越急迫、越来越重要。为此，毛泽东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这里所说的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就是指的大局意识。

解放战争期间，照顾大局、自觉服从大局最突出的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1947年初，为改变战争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要后方，千里行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敌人的腹地。面对这一任务，以刘伯承、邓小平为司令员、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兵员粮草无法补给，其次是黄泛区千里行军，重装备武器无法遂行，最后是目的地大别山地处敌占区腹地，既面临敌人“围剿”，又要建立根据地。当刘邓首长接到党中央“陕北甚为困难”的电报后，“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后来，刘邓大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付了代价，站稳了

脚”，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希望的“争取最好的前途”。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他们以强烈的大局观念、大局意识勇挑重担、牺牲局部，换来了解放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解放战争中坚决服从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一些重大战役中阻击任务与攻城任务的分工，如同“啃骨头”与“吃肉”的差别，但是担负阻击任务的部队都能坚决服从大局，宁愿局部受损，也要照顾全局，为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核心地位，使得在革命进行到夺取全国胜利之时，全党能够在复杂的斗争中保持高度一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解放战争之前，党的领导和根据地建设一直处于分散的战争环境，这种状况适应了当时的斗争需求，但也造成了党内不同程度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对此，毛泽东曾批评道：“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绝不能发展到

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更加急迫。1948年1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规定了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具体要求。3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对报告制度的三条补充规定，进一步规范请示报告制度的内容和要求。8月，毛泽东针对党内仍然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此后，毛泽东又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几次强调要求各地改进向中央做综合报告的工作，认真检讨经验主义、无纪律等错误。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举措，较为彻底地解决了党内不同程度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巩固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了毛泽东作为党中央核心的权威，使全党达到了政治上团结、思想上统一、行动上一致。

紧紧围绕党中央意图开展工作，自觉向中央看齐

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曾全面系统论述了看齐问题，他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

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前方将领能不能自觉向党中央看齐，特别是自觉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看齐，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只有坚决地、全面地、具体地、自觉地向党中央看齐、向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看齐，才可能做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看齐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担当作为，紧紧围绕党中央的意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其中粟裕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1946年6月，党中央提出了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到淮南地区作战，并征询战略区领导人的意见。粟裕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在苏中作战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多次向中央建议，坚持在苏中内线作战，党中央根据他的意见适时调整了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1948年春，粟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斗胆直呈，三次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第一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作战的建议，实践证明他的建议是富有远见的。1948年9月，他首先提出发起淮海战役，尔后又提出将敌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重大建议，被中央采纳，并负战役的主要组织指挥之责，为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粟裕这种主动担当作为的精神，其本质是强烈的看齐意识，是全面、具体、坚决地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看齐。

## 俞秀松：“红色家书”映初心

□ 陈安杰 黄 宇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建党初期，俞秀松告别家人，投身社会。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他时刻牵挂着家人和亲友，留下了一封封情真意切的红色家书，流露出对亲人的思念，对革命的执着。1919年末，时年20岁的俞秀松离开杭州去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工作。他在信中对父亲说：“儿现在要做我自己的事，这事和儿前途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告就去报名’。”“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得完事！”他对父亲反复说，“我是个自爱自奋的人，你可一点儿也不要记念我”。“父亲勉励我的，我当牢牢记心头”。

志存高远——“做一个东南西北人”。俞秀松志向远大，乐观向上，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1919年的寒假过后，俞秀松要离开家乡回杭州，他对送别的弟弟俞寿乔说：“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我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一定。”临上船时，他又补充了一句，“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1920年4月，俞秀松退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来到上海厚生铁厂做工，实现他自己提出的“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并在与工人的朝夕相处中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讲道：“你说要我不必再寄身沪上，回到杭州来。我正〔真〕莫名其妙，我是世界的人，决不是什么浙江，什么诸暨，什么人底的人。身到那〔哪〕里，就算是那〔哪〕里人了。”他还特别提到，“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上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1923年，在给弟弟俞寿乔的信中，再次重申，“我已经要做东南西北人了”。俞秀松为救国救民，毅然离家

投身革命，并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他还时常劝慰朋友，“做人总要乐观，要乐观，总要前进”。他曾对友人路致襄讲“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1921年3月，俞秀松被作为正式代表派往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二大，在他给父母和家中诸人的信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的代表”。俞秀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其伟大人格令人敬仰。

敏于求知——“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俞秀松好学慎思，用知识积蓄革命的力量。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广泛接触了《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来自上海报刊上的新思想，使他更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以能言善辩名扬于校，并创办《浙江新潮》，传播新思想，但他却常常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求。“现在很觉得我的学识不够，我总想努力用功研究才好”，这是1920年3月，俞秀松在给父亲的信中表达的真情实感。一段时间以来，俞秀松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家人和朋友冀望他成为“学者”，“从前我以‘学者’自奋的人，我底父亲，我底朋友，也都以‘学者’期望我的。”而离开杭州之后，“学者的念头就打破了，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但干革命也需要知识，“我现在决计在二三年之内，专门学习一种求知识的工具——外国文——，然后再来干社会事业”。1922年，俞秀松在福州开展工作时写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几年我没有好端端用功读书，现在到〔例〕要乘机用番功夫。”“我现在每天四小时公事，但极其空闲（实在等于无事），倒是自修读书的好机会。”1927年11月，俞秀松在列宁学院深造期间写信给家人：“我虽离国三年，固无日不忧念祖国，但我现在只有努力研究学问，以为将来社会之驱使，又有何能为力！”

淡泊名利——“做官？我永不会有这个念头！”俞秀松心怀坦荡，

从不追名逐利。当传言许崇智取代陈炯明当选福建省长时，其下属军官争相谋取官位，唯有俞秀松除外，他喊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叛国殃民的国妖！”在新疆工作期间，新疆省主席李溶送来委任状，任命俞秀松为省教育厅厅长，他断然拒绝，“我要是想做官，我早已回浙江当教育厅长了”。1923年，他在信中对父母说：“我平常痛骂现在做官的人，所以我在此除学军事知识外，做官两个字在脑中是没有转念的。”他对军阔深恶痛绝，“我之决志进军队是由于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的压迫，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进军队学军事知识，就是打倒军阀的准备工作。”当囊中羞涩不能接济家人时，他多次写信，“我现在不曾帮助父母负担多少责任，心中颇为不安；但我不能如那般醉迷做官发财的人同流合污去敲詐民财，一时确是不能帮助”。“我一定要以自己工作所得报酬的钱，将来总可接济若干。”俞秀松每到一地工作常兼任多项职务，尤其在新疆时期，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务，兼职工作理所当然可拿兼取薪水，但他考虑到人民的疾苦，坚决不收兼取金。新疆当局曾经要为他买小汽车，被他婉言谢绝，“我还是走走路、骑骑马好！”他一生不争名、不为己，勤勉工作，一直过着最为简朴的生活。

1937年12月，俞秀松被诬陷为“托派”，在新疆遭到逮捕并押赴苏联。1939年2月，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害，时年40岁。1962年，俞秀松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经过漫长的革命岁月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俞秀松的红色家书保存至今，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追忆初心，缅怀先烈提供了经典文本。



1951年底，党中央在全国发起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打虎”成为这场运动的聚焦点。为什么在新中国刚成立、各项事业热火朝天推进之时，要开展“打虎”运动？

东北局的一份报告

1951年8月31日，东北局召开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提出，自东北转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不仅如此，在东北一级机关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于盗窃国家财富、侵吞公产的行为熟视无睹。大会建议在东北一级机关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重点揭发、打击贪污蜕化以及官僚主义现象。随后，东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近三个月中，共揭发3629人有贪污行为，仅东北贸易部检举揭发的金额就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由此，贪污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机关开支也随之大大紧缩。11月1日，东北局将开展这项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第一次将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阅后敏锐地觉察到，政府部门各级干部贪污腐败问题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严重和迫切的任务。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呈现长期化的态势。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国家的全年预算比1950年预算增加了60%，其中总预算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而未来的一年，国家计划进行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这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新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增产节约。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他强调，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随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毛泽东下定“打虎”决心

东北局报告上来之后，中央又陆续接到其他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报告。北京市的报告反映，其机关和企业部门中发现有贪污

分子600多人，贪污金额共达15亿元。西南区的报告反映，1950年上半年该区就发生贪污、渎职案件2000多件，折合人民币110余亿元，粮食200多吨。尤其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时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的贪污问题令人触目惊心，这两人胆大妄为，暗通曲款，动用各种粮食折款30.4亿元，同时还克扣工程款获利22亿余元，冒名修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40亿元私用。这些情况报到中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深感事态的严重，更加坚定了“打虎”的决心。

1951年12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干部，凡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浪费，都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三个系统，自上而下在各级分别成立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主要领导同志专司负责，彻底揭露打击各种贪污行为，对大贪污犯予以重点惩处，对中小贪污犯主要是教育改造。这样，新中国第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打老虎”必须“穷追务获”

自1952年1月中旬后，“打虎”成为“三反”运动的高潮和焦点。当时规定，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是中小“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是“大老虎”。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为推动全党全军强力“打虎”，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很多的指示、批语和书信。他强调：“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搜寻大老虎上，穷追务获；对还没有做出“打虎”预算的，要抓紧预算报告中央；要总结“打虎”经验，组织专门“打虎”力量，向“大小老虎”突击，对“打虎”运动进行了强有力的指导。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全国的“打虎”运动走向高潮。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判大会，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北京市召集各单位领导开会，责成上报“打虎”的具体数目，要求主要领导亲自上阵“打虎”，务必必成。随后“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华北军区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把“打虎”专业化，在5天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

## 一份报告引发的「打虎」运动

□ 颜 慧

老虎”12只，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广东则是先找“老虎窝”，然后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最后对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这样，不管“老虎”如何老奸巨猾，都可以攻破。当时，在广东广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

“打虎”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对党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廉洁的一次有益探索。通过“打虎”运动，惩戒和肃清了党内的一批贪污腐败分子，震慑了全体党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进城后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权力寻租现象，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进行“三反”运动不行，但早进行条件不成熟，再迟一点更不行，那一时期是条件最成熟的。

